

红岩精神政治品格的历史诠释与当代传承

兰桂萍¹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所熔铸的“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政治品格，是红岩精神最富魅力的精神特质。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璀璨明珠，红岩精神始终标注着信仰与方向，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传承在无数代人接续奋斗中。在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岩精神的过程中，更应躬身笃行红岩精神六月风荷般高洁的政治品格，深化理论武装，筑牢信念根基，提振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奋力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篇章。

【关键词】：精神谱系 红岩精神 政治品格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22）007-0019-014

中国共产党在奋斗历程中，先后培育熔铸出一系列同根同源、交融互通的伟大精神，它们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它以独特的文化形态标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精神特质，连缀起百年大党奋斗历程的内在精神理路。”^[1]辉煌党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革命精神史。

2021年中宣部发布了由中共中央批准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40余种伟大精神，红岩精神即为其一。“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2]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好传承红岩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提振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3]2022年7月1日生效的《重庆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首次将“弘扬红岩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作出了明确的制度安排。

一、文献综述

自1985年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重要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村考察并题写“红岩精神，永放光芒”，提出“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起，三十年多来学界对红岩精神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深化的过程，研究成果也日渐丰硕。

其一，关于红岩精神的内涵研究。周勇将红岩精神的内涵概括为：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4]。潘洵、刘志平则主张从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巨大的人格力量、浩然的革命正气这四个方面去诠释红岩精神的内涵^[5]。

马奇柯认为红岩精神的内涵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民主团结的统战思维。”^[6]学者们基于不同维度作出的各不相同的学理诠释，丰富了红岩精神的内涵，为进一步研究、

¹**作者简介：**兰桂萍，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2019YBMK005）；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国家认同的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研究”（20SKGH037）；重庆市教委教改重点项目“‘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研究”（192020）

传承红岩精神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二，关于红岩精神的价值研究。黄蓉生认为红岩精神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之源，“能够满足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涵养碧血丹心爱国情、砥砺豪情壮国志、培养奇伟磅礴兴国力、激励舍我其谁报国行的现实需要”^[7]。郭亮、潘洵强调红岩精神曾经鼓舞着一代代青年人的健康成长，“对于当代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具有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8]。

金绍荣等学者主张，“把握红岩精神在大学生理想信念、爱党爱国、道德操守三个方面的教育价值”^[9]，建议通过“三进”“实践”“网络”的路径实现红岩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红岩精神是重庆这座城市的红色标识，“是新时代的教科书和必修课”^[10]。

其三，关于红岩精神的其他相关研究。张朝晖探讨了红岩精神的生成与党的初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红岩精神的内涵是党的初心内在逻辑与涵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态”^[11]。

崔健认为红岩精神是伟大的民族精神与伟大的革命精神的深沉积淀，主张以从“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大视野考察与审视红岩精神的历史之轴和价值之维”^[12]。王炳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坚实的根基^[13]。

总之，近四十年来，“红岩精神在资料汇编、学术研究、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日渐清晰，科学内涵更为丰富，历史地位更为独特”^[14]。但是，对于红岩精神的解读尚需深入，尤其是对于红岩精神区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独特之处的挖掘与诠释尚待继续着力。

二、准确把握红岩精神的特质

准确理解“红岩”，厘清红岩精神研究中的芜杂与混乱，是研究和宣传红岩精神的基础，也是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的前提。

（一）时空之维的“红岩”

作为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红岩是指原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红岩嘴13号。作为一个政治方位，它是当时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也是南方局的秘密办公地。广义的红岩除了红岩嘴13号，还包括曾家岩50号（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的住所周公馆所在地）和虎头岩化龙新村76号（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总馆所在地）。

这三个地方都驻有中国共产党工作机构，它们一起被革命群众视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象征和代表。特别是红岩嘴13号不仅是党在国统区组织领导革命斗争的总指挥部，还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期间的驻地，被视为红岩的核心而备受瞩目。后来国家文物部门为管理之便又将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中共重庆谈判地点之一的“桂园”等地作为红岩革命纪念馆的组成部分。

今天作为红色政治资源而被纪念、作为历史文化资源而被开发的“红岩”，在外延上已经作了更大的拓展延伸。2004年重庆市依托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新组建了事业单位——重庆红岩联线，以实现对重庆红岩文化的研究、传播、教育以及文旅产业一体化建设。今天人们所言之“红岩”，除了原南方局驻地红岩村，还包括红岩魂陈列总馆、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梅园、曾家岩以及郭沫若、冯玉祥故居等一系列革命历史遗迹和红色景点。

（二）厘清“红岩”研究中的误区

要准确理解红岩精神，就必须厘清两个重要的关系。其一是红岩精神与牺牲在白公馆、渣滓洞等地的红岩英烈的革命精神之间的关系。长期从事红岩精神研究的党史学者周勇先生特别撰文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但也存在着时间上的先与后、关系上的源与流以及主体上的上与下等诸多区别。所以他主张用“歌乐忠魂”命名解放前夕牺牲在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等地的英烈们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以示区别^[14]。

重庆红岩联线前负责人马奇柯先生也肯定，以江竹筠、许晓轩、陈然等为代表的革命英烈们不惜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去诠释红岩精神，“谱写了感天动地的人生壮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15]。曾撰写报告文学《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的作者何建明也认为，“红岩精神熠熠生辉，它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所铸就的。红岩英烈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正是对红岩精神的践行”^[16]。所以，前者是源头，后者是弘扬者与传承者，不应混为一谈。

其二是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的关系。《红岩》作为影响一代代人成长的著名文学作品，是基于红岩英烈们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而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不能因《红岩》中存在的艺术处理手段而否定红岩精神本身的真实与价值。小说《红岩》与红岩精神之间是文与史的关系，既不应相互取代，更不能相互否定。

（三）高洁的政治品格：红岩精神的特质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因社会背景、革命形势的差异而各具特色，但都具有内涵高度概括性、主体明确标识性、形态持久稳定性、效果向上引领性等共同特征^[17]。红岩精神和前述革命精神有着相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道德价值、前后相继的理想信念，都奠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但是，南方局的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形成了红岩精神，是区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最鲜明的标识。

“红岩精神是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8]政治品格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核心内容。“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8]这种品格就是在严酷而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始终把党的自身建设放在首位，独立建党、从严治党，不被牺牲所惧；通过“三勤、三化”等制度将党员干部沉潜到社会，永葆党员的先进性，不被浊流所淹；在统战工作中因应时局之变，经得起利欲考验，不被“染缸”所污。正是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南方局的共产党人才能够熔铸出“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高洁的政治品格是红岩精神最为耀眼的闪光点，是红岩精神最富魅力的精神特质。

三、红岩精神政治品格的孕育环境

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央书记处在1939年1月的会议上，“提议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建议改名为西南局”^[19]。随即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博古、董必武、高文华等12人为委员的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四川、广东、上海、江西、港澳以及东南亚等十余个省、市、地区党的工作。直到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在这艰苦卓绝的八年之中，作为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中心所建立的秘密机构，南方局在极端特殊的环境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锤炼出高洁的政治品格。

（一）严峻而复杂的斗争形势

1938年武汉沦陷之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国民党因此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1939年4月《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在国民党内部秘密颁行，以所谓“以组织对付组织”的原则，对如何限制共产党组织活动作出了明确“指示”。比如严饬各地党部、警察局、新闻邮电检查所等机关，“对内容反动及违抗抗战建国纲领之各种宣传刊物如图书杂志报纸小册子壁报等应随时查禁，若经一再查禁而仍秘密发行者应从严制裁以儆刁顽”^[20]。

1939年6月《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出台生效，它更加具体地从军事、党务、行政的21个方面提出了处置共产党问题的“方式与技术”。此后，反共摩擦不断，国民党顽固分子先后制造了“平江惨案”、成都“抢米事件”以及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等一系列反动事件。

国民党肆意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残酷迫害抗日民主人士，镇压解散革命团体。多地党组织遭到疯狂破坏，据统计，川康特委下属党组织成员从1940年的3000多人锐减到1941年的1400余人，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等地方负责同志先后英勇牺牲，南方各省的革命斗争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因为特务的横行、军警的袭扰，叛徒的出卖，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几乎完全瘫痪，大批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失去与党的联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维护统一战线的战略使命

做好统战工作是南方局的首要任务。作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人士交往联系的最直接的渠道，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维系与各派别之间的沟通合作，动员组织一切有利于抗日的社会力量汇聚到抗日事业中来，是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核心目标。代表着不同利益的国共两党，奉行着各不相同的抗战政策，再加之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织，无疑使南方局的统战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国民党虽然奉行反共、限共的错误政策，但作为执掌国家政权、支配社会资源的主要政治组织，它自始至终留在抗日阵营内，这与汪伪政权的失节叛国有本质的区别。在国际上，蒋氏政府仍然被国际社会视为亚太战区反法西斯侵略的主要领导者与组织者。

另外，在国民党内和民主党派中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抗日力量，虽然他们未必认同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政治主张，但对蒋氏政权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持批判甚至抵制的态度。因此，“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21]。

国难当头，共产党秉承相忍为国、团结御侮的原则，主动调整了统战政策。根据形势的变化，1940年3月南方局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在与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南方局以此为指针，转变工作策略，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夯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三）“染缸”式的生活工作环境

1937年11月底，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南为重点的抗战大后方正式形成。国府迁渝后，随着大量人口、资本、企业从沦陷区辗转于此，“重庆城市呈跃进式、突变型发展”^[22]，但随之而来的城市社会问题也日趋严峻。作为抗战大后方中心，一方面是国弱民贫背景下流民衣食无着、转徙沟壑的绝望，另一方面则是官僚奸商大发战争横财，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贪污腐化非常明显。高级官员们携带着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街道奔驰；他们购买了从国外走私来的香水、香烟、柑橘、黄油及其他奢侈品；他们在豪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23]“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畸形社会现象屡见不鲜，贪腐成风、物欲横流的国民党官场生活方式，使战时的重庆犹如一个“大染缸”。

要联络各党派的抗日力量，动员组织抗日群众，南方局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尽可能地沉潜到社会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群体，主动到这个社会“大染缸”中去淬炼自己的金刚之身，坚决抵御各种诱惑腐蚀，以完成统战和群众工作。南方局的董必武、邓颖超等八位同志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参与到国民政府的工作中去，直接与国民党各级官僚甚至社会的三教九流打交道。所以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无异于置身“淤泥”，“同流”自是不可避免，要坚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确属难能可贵。

四、红岩精神政治品格的熔铸路径

国统区的革命环境错综复杂、险象环生，南方局审时度势，将“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贯穿到党建、统战以及群众工作中去，积极应对，忠实而灵活地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努力实现维护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族抗战的战略目标。

（一）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

党的建设是党在百年风雨历程中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南方局通过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使党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中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南方局党组织在重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 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始终坚持独立建党的原则

虽然蒋氏政权在 1937 年 9 月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讲话，但从未放弃过其“党外无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企图。1938 年年底，蒋介石曾在桂林向周恩来提出，要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为一个政治组织，遭到周恩来的断然否定。周恩来指出：“国共终究是两个党，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24]

1939 年初，蒋介石第二次就政党问题约见周恩来，强调国共必须合并成一个大党，蒋的要求再次遭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为此，中共中央在致蒋介石及其五届五中全会的电文中指出，国共合作是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两党合并完全是根本原则所不允许的。

在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后，出现了“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国民党大肆为其一党独裁制造舆论，为其反动的“溶共”政策张目。国民党顽固派为了达到防共和限共的目的，强令所有的机关及学校公职人员以及军队的各级军官必须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

1939 年 5 月，中央根据紧迫而特殊的形势迅即作了规定：“凡本党秘密党员被逼加入的，除特别情形者外，一律加入并报告上级党部批准。”^[24]南方局根据中央的精神，要求各级组织灵活处理，尚未暴露的地下党员可以主动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确认，并要加强对这一部分党员的组织教育。南方局关于特殊情况下党的组织形式，既有效地掩护了危险境地的党组织和党员，又为后续的组织工作奠定了基础。

2. 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采取灵活务实的原则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统区党的工作困难重重，“我们的党员群众遇到各种排斥、追逐、非法逮捕、拘禁与暗杀者有之，这种不幸的事件和倒行逆施的政策，在下层更加成为严重现象，有许多地方且愈演愈烈”^{[25]8}。因此，南方局于 1939 年 6 月调整了组织工作的策略，提出了“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原则，将组织工作重心放到巩固和改造党的组织建设上面。要求在党员同志较多的地方，将考查、整理、巩固组织以及教育党员作为工作重点。

在抗日形势进一步发展变化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时局作了精准的研判，强调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工作应与战争区域、敌后区域有所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26]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应付艰难的时局，南方局根据精简机构、缩小组织的原则，先后调整了南方省级组织的机构及职能。

同时，南方局还对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为保障白色恐怖下组织体系的安全，南方局要求组织与党员之间、南方局与下属组织之间均实行垂直的单线联系。“各级组织布置任务、研究和讨论工作，不再用开会的方式，而是个别进行。

党员向组织汇报工作，也采用这种方式。”^[27]

残酷的斗争环境迫使南方局因时制宜的调整结构和运作方式，据当时在南方局工作的荣高棠回忆：“有的地方一段时间连组织都撤销了，党员转地下不转党的关系。大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停止了，公开的工作方式转变为地下秘密活动。”^{[28]236}同时，南方局组织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就是调动疏散干部，将一些尚未暴露的干部送回延安或疏散到其他地方安置，为革命保存了实力。

3. 在党的纪律建设方面，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

在皖南事变之后，南方省市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国统区的政治局势变得异常险恶，南方局被迫根据形势需要彻底进行干部审查，包括每个党员的政治倾向、社会关系、工作能力以及历史经过等方面，以保证组织的纯洁性。周恩来在强调继续审干工作的同时，要求西南党组织“要从研究干部中懂得爱护、教育、培育、选择、引进使用干部及纠正他的错误倾向，帮助他成长”^{[29]38}。

南方局建立了严格的秘密工作制度，“一切组织和每个党员应绝对遵守最近南方局所发的秘密工作通知，并责成各级组织经常监督与考查秘密工作的情况，凡违反与破坏秘密工作条例的组织与党员，必须受到处罚，直至把整个组织解散（重新改组）和开除党员出党”^{[26]9}。

南方局形成了对干部及党员进行教育的制度安排。教育内容包括时政教育、纪律教育、秘密工作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在国统区心脏地带工作，革命气节教育尤为必要。“因为都随时有被敌特袭击的可能。进行气节教育就是使大家从思想上准备，一旦在突然袭击中被捕后怎样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保护党的组织，保护党的秘密。”^{[28]245}

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南方局成立了由周恩来和董必武为正副组长的高级学习组，学习内容包括中共党史、思想方法论以及党的纪律规章等。1942年以后，在学习整顿三风的运动中，南方局还根据工作环境的特殊性将秘密工作、干部审查、革命气节以及“三勤”方针等内容作为学习的专题，以强化党的组织建设。

南方局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周恩来同志在生日当天撰写的自警七条《我的修养要则》以及董必武同志因为六角钱的账目差错而专门向组织检讨的典故，成为南方局领导严守党纪、以身作则的党史佳话。在国民党官员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环境下，南方局的所有党员干部始终保持人均菜金5分钱一天的标准。

（二）把夯实群众基础作为工作重点

党在1939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把群众工作的好坏当作判断地方党的工作成败的重要标准。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必须有步骤地、有深远计划地，既不懈怠又不冒进地，利用一切公开合法可能而不使党的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相混同的去进行群众组织工作、群众教育工作与群众改善工作”^[30]。党认为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对于克服投降和反共危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号召各级组织要去认真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和群众要求。

1. 南方局群众工作的历史特点

以国统区广大工人、妇女、青年以及农民为对象的群众工作，是南方局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特殊环境下的一项基本的经常性工作。南方局的群众工作随着时局的变化经历了由最初的发展抗日救亡运动转变为在相持阶段隐蔽中积蓄力量，再到后来反攻阶段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历程。

从总体看，南方局群众工作呈现出以下历史特点：以学生运动为主导，学生运动与工人、农民、妇女运动形成合力，工作以点带面、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注重少数民族群众工作，适时转移工作重心^{[31]264-273}。在党的“有理、有利、有节”方针指导

下，南方局因应形势之变，忠实地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将“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政治品格体现到了群众工作中，做到有进有退、有起有伏。

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南方局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制度就是“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工作策略。“三勤”与“三化”政策是南方局基于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特殊背景提出的应对策略，旨在“指示国民党统治区党员要设法深入社会，独立工作，埋头苦干，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27]。它后来发展为党在国统区组织工作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

2. 南方局的“三勤”制度

关于“三勤”制度，已有很多文献记载，其中尤以1947年周恩来与廖志高等同志的谈话提纲手稿《关于“三勤”政策》最为权威。在这篇谈话提纲中，周恩来对“三勤”的时空背景作了明确的界定，主要是1941—1943年间国统区出现了特殊局势：

皖南事变后抗日民主运动呈现低潮，客观环境既不同于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延安等解放区，也不同于完全沉沦的上海等敌伪占领区，更不同于抗战后期反攻阶段的全国性的民主高潮期。所以，“‘三勤’系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种情况下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32]。

它是中共中央关于荫蔽精干方针的具体化，是党员干部撤退、疏散、转移至地下的实现形式。“三勤”旨在要求党员干部转变工作方式，在隐蔽的状态通过“三勤”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以固定职业扎根于群众，立足于社会。“三勤”是指勤业、勤学、勤交友。勤业就是要搞好本职工作，勤于业务，勇于钻研，以职业为掩护。周恩来甚至要求党员干部，言谈服饰都要与自己的职业相匹配，不能像救亡时期那样衣服邋遢甚至蓬头垢面不修边幅。

勤学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学生党员来说要争取优秀的学业才能在学校起到表率作用，对于普通党员来说要苦学业务知识提高业务能力争取成为业务骨干。勤交友就是广交朋友，通过亲戚、老乡、同学等关系广泛联系群众，扩大社会交往范围，并在这些社会关系中逐步发展力量。

3. 南方局的“三化”制度

“三化”是指党员干部要力争通过职业化、合法化、社会化实现荫蔽自己、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关于“三化”的表述不尽相同。周勇曾将其表述为职业化、社会化和群众化）。如果说“三勤”是党员干部个人的党性修养原则，那么“三化”则更强调特殊时期党员干部在组织形态上的特殊性。

职业化就是党员干部不能是职业革命家，而应当在社会上寻求一个赖以谋生的正当职业，使自己有一个立足于社会并易于为公众认知的固定工作，以此来掩护自己的秘密革命活动。当时相当多的青年党员到各地的中小学谋取到教职，然后以教师的身分秘密开展活动。

合法化就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政府部门或社会团体任职，从而获得合法的身份、合法的职业以从事合法的社会活动。南方局指示党员要充分利用他们那些在国民党机关内比较有地位和身份的亲朋来掩护党的机关和成员。董必武获知其秘书侯甸的亲戚与广西高层有联系，遂派其任职广西，后来侯甸利用其县长的合法身份为掩护，秘密为党组织作出了贡献^{[31]94}。

所谓社会化就是党员干部要主动将自己置身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而不能脱离社会关系。此前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员干部在组织上过于机关化，没能沉潜到人民群众中去，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党员干部成功实现了社会化，就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了，既能在危机时刻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保护，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和发动人民群众。

周恩来曾要求南方局的各级组织，要在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主要的群众聚集的单位建立起自己巩固的阵地。“要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如行政机关、团体、公司、交通经济部门等）保有我党组织或个人的联系。”^{[29] 36}

“三勤”“三化”政策推行，不是消极被动地荫蔽党员干部，而是要求他们以合法的形式积极主动地嵌入到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在群众中扎根，在社会中立足，并通过自己的勤奋好学赢得群众，吸引群众并发动群众。“三勤”“三化”政策为革命队伍成功渡过低潮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所锤炼出来的骨干力量为迎接民主革命的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也积淀了宝贵的革命经验。

为防范“三勤”“三化”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南方局特别注重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因为“在这儿接触的社会思潮很多，接触的人也很复杂，能不能坚守信念，能不能始终为民族、为党、为革命事业不动摇，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是很特殊的”^[33]。

（三）把维护发展统一战线作为工作目标

统一战线是党的政治优势和克敌制胜的法宝。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是南方局工作任务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同志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价值有过高度评价：“中国能否由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解放出来，将决定于对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34]如何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至因为激烈的斗争而走向破裂，需要锲而不舍、刚柔相济的政治智慧。在灯红酒绿的“泥潭”里与各种势力周旋博弈，还需要“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革命定力。

1. 因应时局的统战政策

针对相持阶段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的困难，中央为争取时局好转调整了统战策略，明确要求各级组织将国民党中的进步领袖、坚持革命与团结的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军官、中下级干部和党员群众作为统战中努力争取的第一个对象。

中央告诫南方局：“如果共产党不能克服党内外严重存在着的那种骄迈的清高态度，那种同国民党员及社会各界人士格格不入的态度，……则我们党的经过统一战线经过国共合作以争取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我们党的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大多数及一切进步分子共同一起去克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的政策，便将成为空谈无法实现，争取时局好转就将成为不可能”^[35]。

南方局根据1940年3月中央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在与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按照“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组织要求，在艰难时局中开展统战工作。

2. 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南方局通过党内外骨干，利用多种渠道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民族工商业界、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以及宗教、华侨界的代表人物等。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等用襟怀和至诚同他们建立起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合作关系。

首先，力促国民党抗战到底。南方局的共产党人秉承相忍为国的原则，通过各种努力促使国民党始终留在抗日的阵营中。周恩来与冯玉祥、张冲、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董必武、邓颖超等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参与国民参政会，积极为抗战建国献计献策。叶剑英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参与国民政府军委会组织的游击战军事骨干培训。

其次，助力中间力量的发展壮大。毛泽东同志强调：“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36]1939年在董必武的积极帮助下，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以及民社党、青年党等发起组织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后于1941年

改建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南方局尤其注重联络并发展与各抗日小党派、地方实力派、上层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通过照顾他们的利益诉求的方式获得了他们对共产党抗日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最后，寻求港澳及海外关系的支持。南方局在香港设置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在潘汉年和廖承志的领导下，办事处积极寻求各种渠道与港澳及东南亚等海外华侨保持广泛接触和密切联系。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不但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物质帮助，还在华侨中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在党的统战工作史上，南方局在国统区艰难的八年，被公认为是内容最为复杂但成就最为卓越的八年。胡乔木同志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37]

3. 同流不合污的统战原则

要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就必然要在国统区灯红酒绿的特殊环境里，深入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要去跟不同政治倾向、不同利益诉求和不同思想觉悟的各色人等广交朋友。在这个过程中就要防范各种腐朽生活方式的诱惑与侵袭，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本色，永葆共产党员的纯洁性与先进性。

1943年5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政治秘书宋平同志的文章《同流而不合污》。从某种程度上讲，该文是南方局共产党人关于如何在广交朋友的过程中坚守统战原则的真实写照。共产党人的使命决定了自己必须广交朋友，但在交友时应坚守原则，究竟怎样才能“同流”而不“合污”呢？这就要我们自己在和朋友的交往中，不论何时应永远保持共产党员和群众的不同特点。在思想上是分明而不能是模糊的，在行动上要有分寸。

为了接近朋友，有时是可以作某些迁就的，然而也要有界限，就是迁就不至影响自己的立场和本质。他强调，对外交往不但要讲究艺术，手段巧妙，还必须要审慎，“结交朋友也不能是狐朋狗党，不做好事的私人利害朋友，而要成为良朋益友。否则，不仅会失掉朋友，而且会失掉一切”^[38]。

五、红岩精神政治品格的时代意义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璀璨明珠，“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是红岩精神区别于其他革命精神最富魅力的精神特质。八十多年前革命前辈们缔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始终激励着我们不懈前行。“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3]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用好红色资源，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宝贵的政治品格，厚植爱国情怀，书写建功立业的新华章。

（一）红岩精神的政治品格是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参照标准

党的建设是党在辉煌历程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号召，要通过从严治党，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18]。可以说，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使党建工作面临诸多新课题。

今天，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加之一些封建思想的影响，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了享乐主义和贪腐现象，个别地方奢靡之风盛行。如何面对新形势下各种“灯红酒绿”的诱惑，如何在利欲的“泥潭”中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高尚节操，自觉抵制那些“染缸”式工作环境的侵蚀，坚持洁身自好，无疑是党员干部在新征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

南方局的共产党人给历史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他们严于律己的革命精神，矢志不渝、行远弥坚的精神风范，守望理想信念的坚定立场，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不为浊流淹没、永葆党员先进性的六月风荷般高洁的政治品格是我们今天党建工作的标杆。在异常险恶的革命环境里，南方局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的自律、乐观、团结、节俭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同样是今天的党员干部自诫自警的一面镜子。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各级党员干部如何自觉抵御各种诱惑，“既推动经济繁荣发展，而又保持自身干净洁白？这是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一道大考题”^[39]。在日常组织生活的学习中，应以红岩精神的政治品格为参照，感悟历史，追思前贤，寻找差距，汲取力量。党员干部要全面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增强维护意识、坚定维护行动、提高维护能力、确保维护效果，切实把“两个维护”体现在履好职责、做好工作的实效上。

（二）红岩精神的政治品格是新时代思政教育的教学资源

红色资源是党艰难奋斗的历史缩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使之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大学校”^[40]。重庆是一座人文荟萃、底蕴厚重的历史文化名城，应着力提质升级一批历史文化街区、红色文化公园、名镇名村和人文景观，“留住更多乡愁记忆，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服务当代”^[40]。

红岩精神曾经鼓舞着一代代青年人的健康成长，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教科书，其丰富的内涵涵盖了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等诸多范畴。各级各类学校应积极推动红岩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在峥嵘的革命岁月里，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信念，不畏艰险，敢于牺牲，无私奉献，为成长中的青少年提供了价值观指引。

他们知大局、识大体，以身许国、相忍为国的胸怀和气魄，展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行为导向。红岩精神体现出来的“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南方局共产党人在广交朋友的过程中不为浊流所淹没，恪守底线、明辨是非，不为利欲所诱惑，不为强权而退缩。

如何择友、如何交友、如何处理好与他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对于在校学生来说，是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一课。结交良师益友而不是狐朋狗友，要做到“思想上分明”“行动上有分寸”。各级各类学校应根据各学段学生的身心及认知特点，撷取红岩精神的相关内容，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品格教育。让红岩精神的政治品格真正能够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最终实现内化于心，外显于行。

（三）红岩精神的政治品格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精神泉源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推动民族进步、国家发展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42]。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充分发挥它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的引领作用，“把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43]。红色基因连接着过去和未来，标注着历史方位，凝聚着一代代人不懈的精神追求。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去保护、管理、运用好红色资源。

当前社会受价值观多元化的冲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潮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有所抬头，这势必会影响到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南方局的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地诠释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理想与信仰，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书写在历史长卷之上。今天，我们学习革命前辈高洁的政治品格，感悟他们伟大的人格力量，要努力将其转化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泉源。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我们学习并弘扬红岩精神，就要在躬

身笃行中传承红岩精神的政治品格，就要持之以恒地进行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增强我们的专业素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提振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奋力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袁国柱.看万山红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1.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01.
- [3]陈敏尔.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奋力书写重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重庆日报,2022-06-26(03).
- [4]周勇.红岩精神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J].党的文献,2009(2):54-55.
- [5]潘洵,刘志平.红岩精神[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37.
- [6]马奇柯.从红岩精神中汲取奋进的智慧和力量[J].红旗文稿,2021(11):39-41.
- [7]黄蓉生,徐佳辉.新时代红岩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11+223.
- [8]郭亮,潘洵.传承红岩精神谱写育人新篇[J].人民教育,2021(11):19-22.
- [9]金绍荣,吴玲玲,刘子璠.红岩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13):28-29.
- [10]匡丽娜.红岩精神是新时代的教科书和必修课[N].重庆日报,2019-6-17(003).
- [11]张朝晖.论党的初心与红岩精神的生成逻辑[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2-24.
- [12]崔健.红岩精神:革命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共铸及其在新时代的价值[J].探索,2019(2):162-170.
- [13]王炳林.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N].光明日报,2021-06-30(016).
- [14]周勇.40年来红岩精神研究综述[J].探索,2019(2):143+151+192+2.
- [15]朱喜坤,马奇柯.彪炳史册的红岩精神[N].光明日报,2021-4-7(008).
- [16]何建明,厉华.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M].北京:天地出版社,2018:1.
- [17]王炳林,房正.关于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4-15+155.
- [1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02).
- [19]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局领导成员的决定[G]//南方局党史资料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0:3.

[20]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G]//南方局党史资料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 党的建设.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346.

[21]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G].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86:167.

[22] 隗瀛涛. 近代重庆城市史[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45.

[23] 费正清, 费维恺.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 下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588.

[24] 中央关于党员被逼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决定[G]//南方局党史资料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 党的建设.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6.

[25] 南方局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G]//南方局党史资料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 党的建设.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26] 毛泽东.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 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G]//南方局党史资料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 党的建设.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22.

[27] 周勇, 李忠杰. 红岩精神研究[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153-154.

[28] 南方局组织部的人员组成及其工作情况[G]//南方局党史资料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 党的建设.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29] 周恩来. 加强西南党组织的建设[G]//南方局党史资料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 党的建设.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30] 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G]//南方局党史资料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 党的建设.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30.

[31] 卓人政.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32] 周恩来. 关于“三勤”政策[G]//南方局党史资料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 党的建设.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58.

[33] 李忠杰周勇解读“中国革命精神——红岩精神”[EB/OL]. [2011-06-18]. http://images1.wenming.cn/web_wenming/xj_pd/jd90zn/ft/201106/t20110618_216510_3.shtml

[34]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745.

[35]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G]//南方局党史资料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 党的建设.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42-43.

[36]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405.

[37] 《胡乔木传》编写组.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341.

[38]宋平. 同流而不合污[N]. 新华日报, 1943-05-22(04).

[39]周勇. 深化和推进红岩精神研究需要把握的若干关系——论历史学视域下的红岩精神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1-15.

[40]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N]. 人民日报, 2021-06-27(001).

[41]习近平. 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5-31(002).

[42]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001).